

# 张申府：张岱年学术上的引路人

钱耕森 沈素珍

张岱年（1909~2004），著名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、文化学家、教育家、一代宗师。张申府与张岱年两位先生乃是同胞兄弟。按兄弟排行，张申府为老大，张岱年为老小。在张岱年之前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因此，他们兄弟俩的年龄相差较大，多达16岁。张岱年的成长，特别是早期（1936年前），得到了张申府全面而巨大的帮助。

张申府（1893~1986），本名崧年。他于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14年夏提前报考北大本科，考入文科哲学门，两个月后转入理科数学门。他既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，又很爱好哲学。鱼与熊掌“二者得兼”，乃是他的志向。于是，他游学于二者之间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路径。他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里丰富的资源，博览群书，尤其是日、德、法、英等原版书籍。他格外青睐罗素的思想，甚至达到了“痴迷”的地步，并终其一生信奉不渝。1917年夏，张申府肄业于北大理科数学门，破格留北大当助教。

张岱年出生于北京，三岁时随母亲回到家乡河北省献县杜生镇小垛庄，而其父与长兄张申府仍留在北京。张岱年五六岁时，进村中私塾念书，背诵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论

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也读过新式小学课本。1920年4月5日，其母病逝，遂由其父带领兄弟姐妹回到北京。这年秋季开学时，由其大兄张申府安排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念书。张岱年时年十一岁，上高小一年级。直到这时，他们兄弟才欢聚一堂。

此时，张申府在北大的教书生涯才刚刚开始。张岱年说：



钱耕森

“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，留校工作，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，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。他白天都不在家，早出晚归。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，我们只知他很忙。不久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，几年后才回国。”这是张岱年晚年的回忆，依稀留下了当年幼小心灵深处渴望多



张申府



张岱年



1921年春,张申府(左一)、周恩来(左三)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

与哥哥相处、却又失望而无奈的心迹。

1924年,张申府由李大钊推荐,前往广东大学(中山大学前身)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。同时,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,他以共产党党员身份任政治部副主任,不久即辞职。同年秋天,他被广东大学解聘。1925年1月,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,因讨论党纲与人意见不合,遂于会后退党。1928年起,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、大陆大学、厦大、中国大学、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、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,并曾任清华哲学系专职教授,代理系主任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时,他出任总指挥。1936年2月被捕入狱,经多方营救后出狱。1936年8月,清华解除了他的教职。可见,张申府实可谓命途多舛!

这段时间,张岱年于1923年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

附属中学,1927年春考入高中。他上高一时,看到他“很感兴趣”的“中国哲学史”课的老师兼班主任汪伯烈先生在《认识周报》上发表的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文章,评述了胡适、梁漱溟、朱谦之、张崧年的思想,说“张崧年是中国新实在论的代表”。“这时我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。”

## 二

张岱年在高中只念了一年半,就于1928年夏提前考上了清华哲学系。但他旋即因不习惯于国民党的军训而退学,改考北师大教育系。他说:“1931年至1933年,我虽在师大听课,而大部用于自学。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,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。”

关于中国哲学,张岱年不但能自学,还能为文。早在上高一时,他就写了一篇批评韩

非反对道德教化重刑赏的《评韩》,“汪师甚为欣赏,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说: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,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此。”之后,他写了一篇《关于列子》的考证文章,发表于1928年3月的《北京晨报·副刊》上。他说:“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得稿费银元8元,当时甚为欣喜。”据说,这8元相当于当时北大图书馆馆员一个月的薪水呢!他还写了《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》一文,发表于1931年6月的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上,“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,后被选入《古史辨》第四册中。”冯友兰先生也看到了,他说得很有趣:“余偶见一文,署名季同(即张岱年的笔名——笔者注),以《老子》为晚出,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,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,心颇异之,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。后知其为

一大学生，则大异之。后又知其为张申府先生（崧年）之少弟，及得见，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，气象木讷，若不能言者，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，乃益叹其天资之美。”

张岱年回忆说：“关于西方哲学，在吾兄申府之引导之下，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。最喜读罗素（B·Russell）、穆尔（C·E·Moore，也译摩尔）、怀特海（A·N·Whitehead）、博若德（C·D·Broad）之书。”最大的收获是“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。”同时，张岱年又“读了恩格斯《费尔巴哈论》、《反杜林论》和列宁《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》的中译本，虽然译笔不甚明畅，但能窥见大意”。当他把辩证唯物论与当代西方的新实在论、实用主义、生命哲学、突创进化论、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“作了比较”研究之后，他发现“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而又切合实际”。所以，他认为辩证唯物论“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”。从此，他毕其一生，矢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渝，且愈老愈笃。

### 三

张岱年不仅好学深思，而且也爱著书立说，坚持不懈，终于著作等身。在他执笔写作之初，有幸得到长兄张申府莫大的帮助。当其时，张申府恰好任清华哲学系专职教授，同时兼任天津《大公报·世界思

潮》副刊的主编。该副刊专门“登载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，用大篇幅宣扬辩证唯物论”。这就为他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与空间。笔者统计了一下，《张岱年全集》第1卷收录1931-1953年的论文共46篇，除最后两篇《人与世界》和《认识·实在·理想》系第一次发表的往日存稿以外，剩下44篇文章中的26篇均撰写于1932年9月~1934年1月的一年半之内，悉数发表于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副刊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张申府以主编身份对1933年5月25日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副刊上刊登的张岱年《论外在的实在》一文特意加了按语，予以高度评价：“季同此篇，析事论理，精辟绝伦。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，心神不宁，遂尔忽之。同时更宜信：有做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，并不是容易灭亡的。——编者特记。”可见张申府用心良苦，一方面意在鼓励其弟继续写好文章，一方面以资激发广大读者的抗日爱国主义精神。

张岱年晚年回忆时感念不忘地说：“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副刊，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，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，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的开始。”

### 四

果然，著名新儒家熊十力

注意到了张岱年发表在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副刊上的文章。他对张申府说：“我想和你弟弟谈谈。”张岱年听说后喜出望外，专程去拜访熊十力先生向他虚心请教。“于是我访问了熊先生。熊先生赠我他的著作《新唯识论》与《破破新唯识论》，我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。”熊十力比张岱年年长24岁，但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。

张岱年还专程拜访了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。金岳霖告诉他说：“你写的《问题》一篇分析很细，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。”他的这篇文章，是他在1929年的Monist上读到了柯亨（P·S·Cohen）《什么是问题》（*What is a question*）一文后感而写的。柯亨的结论是：一个妥当的问题是有一个答案并且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，没有答案或有二个以上的答案，便非正确的问题。他认为这样的“立言甚精”。但他又认为自己的观点与柯亨有异：“他注眼在问题的基本假设上”，而自己的主张则是：“在哲学上，问问题是不可以随意的。在讨论哲学问题时，应先考察其所根据的假设或观点，也即考虑其所根据的命题。”并且，他还进一步提出：“我们不能说不当隐含了假设的问题：要是那样，就根本不能提出问题了。事实上没有不隐含假设的问题，只看所隐含的假设对或不对。”

他还列举了许多例子，其一是：“例如问‘宇宙何始何终？’这所根据的命题是宇宙有始终，或宇宙有所谓始终。这个命题就是不对的。应当先问：宇宙有始有终吗？‘始’‘终’二范畴固可用于宇宙内的个别事物，但不能推而用于总括全宇宙。”这篇文章是很短的一千字文，但通篇却具有分析的特点。金岳霖的慧眼一下就看出了他所具备的超强的逻辑分析能力，并予以好评。张岱年受到很大鼓舞，并很乐意地“努力学习金先生的分析法”。

张岱年还专程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。“我访问冯先生，谈有关中国哲学问题，彼此见解相近。”而张岱年之所以能顺利地拜访到上述三位大师，均与其长兄申府先生直接引见与具体安排不可分。

## 五

张岱年193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，随后到清华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。进清华工作，是很不容易的。这和他本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有关，更和他“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”有关，又和他有幸得到了“冯友兰先生、金岳霖先生推荐，梅贻琦校长批准”密不可分。归根到底则和他大哥不无关系。张申府于“1931年受清华大学之聘，任哲学系教授，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，论学与金岳

霖、冯友兰颇相契合。同时又在北大讲数理逻辑，在师大讲现代哲学，都受到学生们欢迎。同时，他又在《大公报》主编《世界思潮》副刊”。而且，他恰巧在那时代理系主任工作。1933年8月“31日《校刊》第514期发布消息：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在校服务已满5年，照章应于本年休假一年，并赴欧洲考察，校长已聘蒋廷黻代理文学院院长，张申府（崧年）代理哲学系主任”。一年多后的1934年10月上旬，冯友兰才归国回到清华。同月，“4日《校刊》602期刊出二十三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，其文学院部分如下：院长冯友兰……哲学系，主任冯友兰；教授金

岳霖、邓以蛰、张崧年”。这样，张岱年进系办手续，很可能就是在其长兄张申府手里办的。他晚年回忆时还深情地说：“到清华当助教，这是最幸运的事……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。”

张岱年在清华哲学系当助教教的第一门课是“哲学概论”。尽管他学得很不错，也写了很多文章，但是讲课毕竟还是新手，没有经验。其长兄张申府又及时予以帮助。“吾兄申府决定，让我用D·S·Robinson的 *An Introduction to Liring Philosophy* 作为课本。书中内容分（1）导论，（2）唯心论，（3）实在论，（4）实用主义，（5）其它派别。主要是按类型



1951年哲学系欢送业同学时师生合影。站排左起：沈有鼎、张岱年、王宪钧、金岳霖、邓以蛰、任华、冯友兰

来讲的。”教材定了下来，他就围绕教材进行了认真备课，补充了必要的材料。“我讲课时，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，并且较详细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，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。”如此这般地讲课，不怕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，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。而在学生中则受到广泛欢迎。系主任冯友兰晚年回忆说：“其时，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，又非出自哲学专业，选课者除哲学系一年级生之外，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，均翕服无闲言。”冯先生并指出了他讲课成功的原因在于：“盖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‘好学深思’之士，对于哲学重大问题‘心知其意’。讲课者言之有物，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。《周易·乾文言》有言：‘修辞立

其诚’，诚者无妄之谓也。‘心知其意’则无妄。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，无妄之效也；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，亦无妄之效也。”冯先生的评价诚可谓全面而深刻。

## 六

张岱年的父亲于1934年3月逝世。当其父尚在世之时，“由冯友兰先生及吾兄申府介绍，认识了冯让兰同志。”冯让兰，乃冯友兰的堂妹。说起来，张岱年与她算是北师大的同学。1928年，他考入北师大教育系，她则考入北师大中文系。张岱年回忆说：“1935年与让兰在北京结婚，租房住在辟才胡同二条二号。”他当时“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”，遂于1934年暑假前辞去清华的工作，“进城暂住当时的北京图

书馆宿舍”。而他的成名作、五十多万字的巨著《中国哲学大纲》即在此处写成的。

张岱年于翌年即1936年，“由冯友兰先生推荐，回到清华大学仍任哲学系助教，讲授‘哲学概论’与‘中国哲学问题’两门课程。‘中国哲学问题’即以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为讲授内容。”张岱年与冯让兰结为伉俪以后，相亲相爱，相濡以沫，共同度过了八年抗战和被错打成“右派”的二十二年艰难岁月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七十个春秋。他俩同生于1909年，又同死于2004年，均享年95岁。诚可谓同生死，永不离！而两人的伉俪情深也被传为佳话。

## 七

张岱年说，早于“30年代中期，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，我也不甘落后”。于是，他于1936年5月写了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》一文，“大胆提出：‘今后哲学上之一个新路，当是将唯物、理想、解析综合于一。’文章赞扬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新唯物论，而主张‘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’。认为中国哲学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；近二三十年来，解析派的哲学有大的发展，应容纳解析派之新



1997年张岱年（左）与季羨林（中）、李玉洁（右）合影

贡献。”所谓“唯物论”，就是“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新唯物论”；所谓“理想”，就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——人生理想，也包括了辩证法和唯物论；所谓“解析”，就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法。关于三者的关系，他进一步认为应以“唯物论”为“基础”；以“解析”为“方法”；以“理想”为“内容”。他明确说：我主张“以唯物论为基础”，去“吸收理想与解析”；对中国哲学最注重的生活理想，“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”；对有大发展的解析派的哲学，“应容纳”他们的“新贡献”。随后，他就用这个理念，沿着这条道路，撰写出《中国哲学大纲》和《天人五论》两本书，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。张岱年所创新的哲学体系的路向与架构，也是直接受到张申府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路及其理念影响的。他说：“在哲学上，申府既推崇唯物论，又深喜罗素哲学，同时肯定孔子关于仁的学说，多次讲‘列宁、罗素、孔子，三流合一’。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总纲，可惜没有写出详细的论述。我非常赞同辩证法，又钻研数理逻辑，企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。我认为这是有重要意义的。”他承认自己的“‘唯物、理想、解析’三者结合的观点，实受吾兄申府的启发。”但是，他并非简单地照搬照套，而是有所创新。他说：“关于中国哲学，不但



20世纪80年代后期冯友兰（左）与张岱年合影

应重视孔子，也应重视道家和墨家的贡献，而更应发扬王船山、颜习斋、戴东原的进步思想。”并且，是以中国哲学中的人生哲学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为主；关于唯物论，不仅重视列宁的，也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，等等。

所以，1936年孙道昇在《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》一文里，除了分别评述了胡适、梁漱溟、冯友兰、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外，称“以张申府、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”。张申府在清华任教期间，是他“在学术界名望最高的时期”。当时，“郭湛波写了一本《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》，曾将张申府列为专章（被列入专章的尚有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胡适、冯友兰等）。”但是，张申府先生因故终其一生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。张岱年回忆其兄时

说：“约在九十岁时，他对友人说：我吃亏在于没写出一本大书来。这是实情实话。但是后悔已迟了。”

由上述可见，张岱年在哲学上的成长，得益于其长兄张申府的帮助。这种帮助是多方面的，甚至是全方位的；是重要的，甚至是非常关键的。而他则沿着其长兄所指引的方向与理念不断精进，后来居上，终于创建出新的“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”的哲学体系，完全实践了他们兄弟俩共同的夙愿，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走中、西、马三结合的道路树立了一个典范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<sup>[28]</sup>

（钱耕森，安徽大学教授，黄山文化书院终身名誉院长。1952年肄业于清华哲学系，1958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，师从金岳霖、冯友兰、张岱年三位大师。）